

大同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许殿玺 校注

〔清〕黎中辅 纂

公室征集整理

大同市地方志办

大同县志

(晋)新登字 6 号

大 同 县 志

〔清〕黎中辅 纂

许殿玺 校注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征集整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75 字数：627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 500 册

*

ISBN 7—203—02110—6

K·96 定价：27.00 元

前　　言

地方志是国情省情或县情的载体，随着国情教育的需要，愈来愈多的人要求深入了解本地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改革开放，振兴、建设大同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先后整理出版了明·正德《大同府志》、清·顺治《云中郡志》。在总结前两部志书整理得失的基础上，请特约编纂许殿玺先生对清·道光《大同县志》又做了点校注释。许殿玺先生据文推理，判断正误、校勘文字，尽力考证，查经据典，注其出处，历经一年有半，终于完稿。经市志办通审，送出版社付梓重印，与读者见面了。

《大同县志》成书于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知县黎中辅纂。黎为江西东乡人，字濂芗，举人出身。道光三年任大同知县。据编纂者自序：“大同县最古，索其图经县志，则向未有焉。于是公役之下，不惮周历旁览五百八十村，其距城之道里，其村落之方位，其山间水曲向背脉络之情，流行分舍之势，无不笔而记之。茲七年，从容諮访，援昔征今，观其得失而达其源流。”可见其苦心孤诣，不惮烦劳，亲临山川，周访采风。在此基础上，“赖邑中诸绅士执笔墨以从事，设局分曹，发凡起例，搜罗轶典，采辑新编”，草创成志。自序中对修志的目的、意义、方法，特别是突出地方特点上颇有见地。他

说：“察方隅之形势，明古今之损益；因地以制宜，补偏而救弊，励文风与学校，核赋役于成宪；考营建之兴废，校边防之疏密；地为重镇，则兵制亦重；古为都会，则古迹尤先。”此志在凡例上也殊乎俗见，亟可称道，得到方志家的肯定。

《大同县志》前有首卷，后有附录，计二十卷，六十七篇。卷一为《图考》，收邑境、城池等二十图，卷四附村庄图四幅。这些图使大同的山河形势、城池街里、衙署学宫、寺庙陵墓、村庄堡寨、驿站铺递都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显其真，辅其文的作用。

《沿革》中，对大同古今名称、属地，逐朝加以考证，以《四郡考》等书逐条辨析，使沿革彰明。

《疆域》、《营建》中对全县四隅之距离、山川、河流逐一记载。《水利》、《桥梁》等篇，对研究农业、交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星野》《岁时》等篇中，对风霜雨雪雹、旱涝蝗疫震、大熟、大饥、灾异均有记录，为研究气象、地震、疫情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隘》等篇中，详叙明以来边防情况，对明长城、边墙五堡、城堡、台墩以及战例的记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地屏全晋、拱神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对人口、地亩、税课的记载，田亩有鱼鳞册，收支、用途凿凿有据。从商税、畜税、牙税、当税中，可推出当时大同工商业、手工业发展情况。当时仅牙税就达二十三种之多，可见其市场繁荣之景象。

《官师》、《选举》中有明清以来历任大同知县、县丞等官名录和考取科举名录。在这些名录中不乏象吕坤那样清正廉明之文职官员和象郭登那样英勇善战，韬略在胸的武将。对研究地情是很好的乡土教材。

《古迹》中，重点对北魏、辽、金三代遗址、遗迹，从建筑年代、方位、兴衰演变均作了记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物产》中对本地粮食、蔬菜、瓜果、花草、树木、药材、羽毛、矿产等均有记载。特别指出的是谷物中的荞麦、蔬菜中的地蔬、花鸟

中的摇坠和慈老皆为“他乡所无”。其他果类中的酸刺(沙棘)、毛类中的黄鼠、以及各种药材也颇有地方特色,为开发地产品提供了依据。

《艺文》中虽有许多空洞无物的应酬之作,但也不乏爱国主义的佳作。象朱弁的《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记》,借说佛,述己身,苦衷自见。袁枚的《赠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记》,综合诸子百家,化典故为己语,贴切入微,句句有出处。朱彝尊的三皇庙、开化寺两碑记,以委婉之词,巧妙之笔,既不违众说,又对财神、文昌予以否定,提出“生财之道,民生在勤”的道理。元好问、任举等人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作,慷慨激昂,有如万马奔腾之势。于谦、郭登、王铖等爱国将领的马上之作,忧国忧民,伤时感事,抒发了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和保国卫民的赤胆忠心。镌刻在县署事壁上、由知县吕坤亲笔书写的左右二铭,被后人评为“以经史之精蕴,作牧令之良箴”。

此志分类较细,资料翔实,考证精当,体例也趋于完备,又距今较近,是一部可信、可用、可读的志书,对服务当代,惠及后人,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但应当指出,旧志中“精华与糟粕杂陈”,诸如天人感应,皇言圣恩,忠孝节义,维护风教等俯首皆是,阅读时应“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尽管在点校注释中尽心尽力,更正原书错误逾五百处之多,但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尚有疏漏之处,敬请识者校正。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姚斌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一日

点校凡例

- 一、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清·道光《大同县志》，不才谬蒙重任。总的原则，保持原书面貌，只用简化字重排，加以断句、注释，订正文字。对讹夺漏误，于注内说明。分卷附有校注。
- 一、校注，包括注释和校勘，于每卷之后标明志、目，分别于各志、目下，按①、②……排列注号。《艺文》按诗、文题分列注号。
- 一、字形，以《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凡新编《辞海》列有正式字头的古今字，异体字或通假字亦各从原，如：飞与蜚，谈与諶，聳与竦，视与眡，由与縗等等。人名不改，避讳字亦不改。《县志》中同名而不统一处，如采凉山，又写作采掠山，亦未予更动。
- 一、断句，原文因漏字、误字或误解而断句亦随之有误时，就原文暂作标点，另于注内说明订正。如卷七，后魏《乐府》条：“……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应作“五曰《白净王太子》，六曰《企喻》”，放在注中订正。
- 一、注释，提示出处，叙明典故，引征语源，补充史料，有如下几种形式。
 1. 难字，训音注义。
 2. 释义，词语有典者，指出书名篇名。《县志》所引如与典故原义有暗用、化用或反用者，注释时亦加以说明。
 3. 补充，对原文叙事过简的，尽量补充说明，提出根据出处。

4. 提示重要史料：例如清乾隆五十五年灾，骆驼坊龚德以工代赈，特予提出。大同市已拆除的四牌楼坊书额，系邑人王德馨所书，人多不知。明县令吕坤作县署《左右铭》，传抄有误。于此皆特为提出。对西岩寺、黄巢观、玉龙洞即将泯灭的古迹，略作补注；对曹夫（福）楼曹夫无其人，也予指出。

5. 诗文题解及作者简介，紧密结合内容。有的诗文以解题代注。

6. 帝王年号，地名，一般不注，个别情况下也少注。

一、校勘，《县志》讹夺漏误甚多，并于注内出校。

1. 引自史传的，对勘原著，给以更正，如：

人名错的：汉武帝时李沮，误作李俎；明周斯盛误作清晏斯盛。

地名错的：“还击昆民”民，误字，应作“明”。

年月错的：卷十《学校》，县学魁星楼，误记作明嘉靖二十九年创建（应为明万历三十八年）；又如宋宣和十年（宣和七年徽宗禅位，第二年为靖康元年），类此，除正误外，并考其所记事之年月。

2. 一事误作两事，如卷六，宋宣和末，知朔宁府孙益救太原事，分记作孙益、孙翊二人二事之类，皆予订正。

3. 引文虽对，但所引原文原书有误，如《县志》卷十六《人物》冯唐条，“（汉）文帝后元十年以唐为楚相”。这查《汉书》无误。但后元仅有七年；再查《史记》，十年系七年之误，《汉书》原即有误。

4. 职官名错，如护乌桓校尉误作乌桓校尉；达鲁花赤误作鲁达花赤之类。

5. 书名错：如元周密《癸辛杂识》误作“庚辛杂识”；于钦《齐乘》误作“斋乘”；明孙载辑《诗推度灾》误作“诗推灾度”。

6. 词语错：十紧六雄误作十雄六紧，江西诗派误作西江诗派，冷官误作冷官，迁官误作遣官，仕周误作私周，纳土误作纳上，天鸣误作天明，常童误作常童等等，一一出校。

7. 原字不清但可肯定的即予描正。

此外，字义相同的异文或刻工习惯用字，如博与博，奥与弄，健与健……即行改正，不出校。

一、本书抄写校注，历时一年七阅月。虽愚一事不误，一字无讹，而实学力有限，仍是卤莽灭裂。脱略谬误，自知阙失。樽栎之材，谨垂手以俟教！

许殿玺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日

卷 首

凡 例

一 志必绘图，所以辨疆域、定方位、资考证也。盖山峙川流，观其动静脉络，则尺幅而具千里；胜景名区，溯其襟情履迹，则千古皆在目前。故图必征实，始与古今记载相为发明。若夫夕照朝烟，霜钟渔唱，不过眼前诗料而已，各处皆可移掇，于义奚取？

一 云中自汉唐以来，久为重地；志为典要之书，当明所尤重。北魏都平城而风会^①已开；前明筑五堡^②而边防益密。风土学校与通都名邑相抗衡；营制武事非偏隅僻地所经见。考古者不为传说所讹，省方者得备𬨎轩^③之采。此志之所由作也。

一 山川、人物、古迹必共相贯串，或古今分合各异，亦当辨其源流。《府志》以磨笄夫人首《列女》，无如磨笄山^④之非境内也（《省志》：“磨笄山在代州。”）夫代地先于云中，安得以云统代？其有实属云产而为分合所讹者，亦当辨之，以免滋惑。若何忠愍^⑤之通籍，注威远堡。考其经魁坊建于云城，祖墓孙支亦在大同（按《何氏家谱》：明太祖迁太原军以实威远卫，何氏在云中。其时未立朔平府，故威远属大同，而应试仍书军籍。《明史》未及考正。）至如云冈旧隶大同，今割归左云。故自朱竹垞、曹秋岳两先生^⑥以后之名流题咏，皆不收入《艺文》，以严疆

界之辨。

一 节性防情，礼乐之用大矣。即娴雪仪文，亦陶淑^①之助也。有相沿而不知其失者，如春、秋丁祭，按《大清通礼》：上香、读祝、三献、饮福，皆承祭官升东阶，自殿左门入；退，及殿左门，北面揖出，降阶，复位。今各州县引赞，退出由殿右门，无北面揖之仪。必遵《通礼》行之，始能见“对越”^②之诚，趋跄之节^③。今备载《学校》卷中，以为士子观摩之益。至士庶人昏丧二礼，录《通礼》以示周行，则风俗有厚望焉。

一 “唐俗勤俭”一语，晋人作志者皆引之。不知居今日而犹上溯十五国之《风》，何异言山者必曰导自昆仑也乎？《府志》以《史记》代北之民“任侠为奸，不事农桑”登之风俗，不知言各有为，《货殖》一传，太史公发愤之所为作也。今于历代地理志等书，不钞录一字，而以今日之间习尚质言之。物产亦不侈陈，其常有者无足志，希有者罕得而志；气寒霜早之区而夸言丰饶，是诬也。兹《风土》一册，藉免雷同。

一 年表本于史体，作志者多仿之，旁行斜上，文简而事汇。然有谓体例严重，一州一县，非通志之比，可以不立者。窃谓《官师》一册，以表列之，则同时同官，了如指掌。他如《选举》科目，固无庸此。

一 人物之见于史传者必备录全文，而其人之本末始见。若删节其事实，则挂漏殊多；改窜其字句，则文义不古。即寓贤如朱弁、洪皓，古之不辱君命者也。若舍《宋史》不录，另撰数行，而谓足以抒其忠义之气，耿日月而薄云霄，窃恐未必有此笔力耳。再四筹之，以直录史传为是。（《临汾志》以史传入《艺文》，义亦未安。）

一 善善从长，史家之通义。居今日而言孝友、言行义，动引古人以绳之，斯亦苛矣。苟有一节之可取，亦可为民行劝也。然体例必严，以盖棺为定论。且稍涉嫌疑，则务从割爱。至事亲而仅曰温清尽礼，行义而仅曰好善乐施；毫无实事，徒托空言，则批示发房，俟再访察。志贵矜慎，未便遽登。

一 刘向之传《列女》，采其闺范之足为法鉴，不专取节操也。后世多以剖股疗姑，杀身殉夫之事为奇，究之轻庸行而崇激烈，非古人闺教之轨则焉。命妇称贤不称节，盖守节其固然耳（卷中如命妇任夫人从《府志》，节妇移入《贤媛》。）有司谳狱，凡守义不污者，例得随案请旌。而节妇年逾五十，或节逾十五载而歿者，亦例准旌表，绰楔既荣，则志乘宜先。至穷檐小户无力请旌者，必访闻甚确，而年寿复高，始为备录。兹以《贤媛》列首，而《节烈》次之，庶足分清眉目。

一 《艺文志》诗文二卷，虽于名流翰墨、时贤著作，极力搜罗。然自愧学殖荒薄，闻见空疏，于各家文集、诗集，未能穷搜博采，且成书颇速，广辑为难，深恐义例未安。惟冀宗工哲匠，正其差谬，匪特中辅之幸，且邑人之幸也。

豫章黎中辅濂菴再识

校注

〔卷首凡例〕

1. 风会：好的机遇。
2. 五堡：见卷六《关隘》。
3. 省(xǐng)方：视察四方。出《易·观》。 辙轩：见前顾腾伊序注②
4. 摩笄山：春秋晋赵毋邮（襄子）以其姊嫁代王。后又杀代王，侵并其地。其姊摩笄自刺而死，因称摩笄夫人。代人名其所死之地为摩笄山（见《战国策·燕一》、《史记·赵世家》。山在今河北宣化东南，又叫鸡鸣山。又说：在河北蔚县东南，即马头山。明尹耕《摩笄山辨》，谓在上谷境。按马头山近代城，以马头为摩笄，其说近理。）
5. 何忠愍：明何廷魁，万历进士。死辽阳之役，谥忠愍。
6. 朱竹垞：清浙江秀水人，名彝尊，竹垞是号。 曹秋岳：名溶。明崇祯

进士。顺治初归清，曾官山西阳和道。工诗。

7. 陶淑：培育善良。
8. 对越：《诗·周颂·清庙》：“对越在天。”言德配于天。
9. 趋跄：步履有节奏。
10. 绰楔：立于门两旁表扬节孝义行的木柱。

大同县志

鉴修

大同府知府崔允昭又村直隶大名县人戊申
纂辑

大同县知县黎中辅濂梦江西东乡县人乙卯
分订

大同府儒学教授陈衍震位东绛县人壬子

大同府儒学训导李 泽兑山河津县人甲子

分考

大同县儒学教谕聂应聘汤宾荣河县人庚午

大同县儒学训导武锡珪东青荣河县人庚午

经始

原任大同县儒学训导乔世哲 解州人辛酉
理局

大同府经历章知仁松崖大兴籍绍兴人监生
董工

大同县县丞张从简敬堂陕西潼关人附贡
督刊

大同县典史章祝三竹山大兴籍绍兴人监生

本籍绅士

- 参阅 戊子科举人李发上林
戊子科举人袁儒锦文藻
- 编次 癸酉科拔贡生杨霖雨林
癸酉科拔贡生张志仁耐亭
- 校录 候选训导岁贡生刘士逵渐于
附贡生郭楫五兰溪
县贡生郭庭槐荫堂
- 校刊 候选教谕恩贡生姜系岳西堂
附贡生霍宗文止敬
附贡生张庆余庭有
- 总局 原任天津卫守备(时年九十四岁)赵万邦静庵
原任顺天府司狱何应枢汉章
即选县丞王绵德興
即选县丞郭百里寄堂
- 采访 县学廪生黄文杰蔚然
县学增生杨森玉立
县学增生王国柱翼堂
县学附生孟师曾省三
- 稽考 县学生郭鸣銮西轩
- 绘图 县学附生师文春圃

大同县志序

道光庚寅春，余将校士^①云中之先，适大同明府^②濂芗黎君以所辑《县志》来质。初读之而以为记事之书也；再读之而叹为得心之言也。夫大同自辽立县，于今千数百年矣，不可不志固已。然集众人之志与因前人之志以为志，凡能志者皆可志也。而创一家言以善权舆^③之始，非久于其地，习知其事者，亦乌得而志之哉？夫久于其地，习知其事者，宰^④斯土者也。顾宰斯土者之久于其地、习知其事与生斯土者同。而其为志，则或仅以备文献之参稽；或足以觇经济之虚实，源流异而体用殊焉。岂非以宰斯土者本政事为文章，举一切因革损益、宜民善俗之方，无不关身心之体验，较诸征信于见闻者，固有精意存乎其中哉？是故理烦治剧之才，挟其聪明识辨，于境内山川风俗、利病得失，无难了若指掌，凿凿言之。而其举而措之者，苟未有实心实政以身体力行于其间，则虽兴除修复，亦铺张补苴^⑤之陈迹也。况纸上之空谈乎！今黎尹所志，事必从阅历中来，语皆自肺腑中出，盖其所以志大同者即其所以治大同者矣。余故曰，得心之言，非记事之书也。虽然，朱子^⑥知武康，下车伊始，即问志之有无。习其治，诚不可无其志。而武侯治蜀，蜀志独略。古人治迹存亡，有时听诸气数。矧云中朔漠边荒，自昔戎马战争殆无虚日，载笔者更莫能于倥偬旁午中远揽旁搜，垂之简册，以贻来兹。而黎尹躬逢盛世，得与此邦人民涵泳圣泽，从容于休养生息之余，以其

耳目心思所独得者，上下古今，折衷至当。用以润色休明，宣德而达情焉。是则际得为之时，因有得心之言，而即以成不刊之书也。又未始不可为黎君幸！且为此邦幸、与后之官此邦者幸也夫！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 三月望后 山西督学使者昆明李煌撰